

访谈 | 吴国光 |
王天成 |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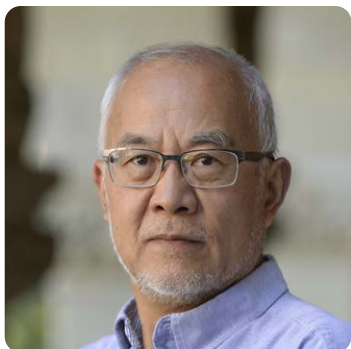
第3卷 第4期

2025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想象一个没 有共产党 的中国 (下)



吴国光



王天成

编按：“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没有共产党专制或别的什么政治专制的状态下”，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吴国光教授说。这位著名的华人政治学家最近反复提出要走向共产党后的中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要点明这一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制度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中国毛后改革的实际终结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早？如何看待目前一些人对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怀念？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是否证明了“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为什么民变促发官变是中国可能的转型路径？如何看待有官方宣传因素在内的、许多人对民主化可能导致经济放缓和国家动荡的担忧？

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专访了吴国光教授，产生了这个深度对话。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在许多人那里好像有难度了，这种思想境况需要改变。

王天成（以下简称王）：我们已经谈了中国模式，现在来谈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中国从专制转向民主的模式。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有三种模式，是改

革、革命，还有就是革命与改革的混合，我称之为“革改”——政府（内部温和派）与反对派通过（圆桌）谈判来决定转型过程，像东欧一些国家的转型。你在谈到转型路径时提出了民变促发官变的设想。如何界定民变？如何界定官变？为什么民变促发官变是一种可能的转型路径？

吴国光（以下简称吴）：民变，简单地讲，就是民众抗议。其实中国官方的语言讲得很形象，叫“群体事件”。讲民众抗议，有时候会有误解：一个人举个牌子上街，这也叫抗议吧？这里这个“众”是很重要的，即一定要是群体的抗议，我认为才可以称为民变。官变，就是面对民众抗议的时候，统治者内部公开出现了强硬对策和温和对策的分裂。我强调“公开出现”，而不仅仅是私下表态。也强调一定是面对抗议的时候出现分裂，而不是平时关于施政的意见分歧。再就是，只有民变和官变还不够，而接下来的事态如何发展，是关键。

回到你讲的民主转型的三种模式，我想可能和亨廷顿讲的是一致的吧（王：是一致的）。他讲 transformation，转变，你这里讲改革；replacement，替代、颠覆、推翻、革命；再就是 transplacement（交叠替代），也就是你讲的革改。我看晚清革命，即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型，应该说是 transplacement。辛亥革命起来后，清廷里边袁世凯这些人最后也采取了反清的动作，革命就成功了。

从民国到中共，不是民主转型。但是，我觉得，民主转型的三种模型，其实也可以用来分析不是走向民主的政权更迭。民国到中共是 replacement（替代），那就是颠覆，但里边也有 transplacement（交叠替代）的因素。中共实行武装革命，但如毛泽东所讲的，武装革命也只是他们的三大法宝之一，

还有一大法宝叫做统战。统战就是去扩大 transplacement 的那些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不是国共统一战线，共产党不可能那样坐大而迅速发展势力。到了国共内战时期，第三势力本来是和国民党合作，但被共产党争取过来了，还有国民党政权内部很多高官是和共产党合作的。国际上，甚至美国最后也试图要和中共合作，不再支持蒋介石政权了。1949 年解放军攻进南京的时候，苏联大使馆跟着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去了，美国大使留下来欢迎解放军进城。结果，中共不理，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把门关上了。这都表明，共产党也不是简单地只靠拿起枪杆来造反，其实也充分利用了很多其他因素。而且，从民国到中共，还是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

未来中国的转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路径呢？看亨廷顿讲的案例，我感觉 transplacement(交叠替代) 应该是一种比较可能的一种路径。首先，转变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改革这条路已经早就走不通了。刚才讲过，1989 年的事情已经把 transformation(转变)，即当局主动推动，与社会应和，自上而下完成民主化转型的路堵死了。现在还有人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的力量来对习近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但是没有人说，我们把习近平路线颠覆了以后会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他们要的是习近平之前的权贵资本主义。反习近平、想推翻习近平的人不想往民主化走，共产党内哪里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主动把中共推向走民主化的道路呢？

那么，革命这条路径呢？在推翻专制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所有的革命 (revolution)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军队。当军队改变立场以后，民主革命才可能成功。中共对军队的控制显然是非常严密的。目前我看不到民主力量能够针对中国的军队展开有效工作争取军心。也许有人在秘密进

行，我现在至少是不了解。从更广阔的画面看，在中国这样一个控制非常严密的国家，中共本来就有非常组织性、体制性的严密控制，再加上信息技术等各种帮助，特别是中共在经过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以后国力大大增强，要成功推动自下而上的革命，显然困难很大。

所以，我觉得，transplacement，就是你讲的“革改”，革命与改革的混合，是一个可能的路径。但是，中国的“革改”，我觉得倒不一定完全会按照亨廷顿讲的步骤来展开。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讲大体上有四步吧。第一，专制当局放松。在这个情况下，第二步，反对派就有力量，有壮大。壮大以后，当局希望加强控制。这时双方进入谈判；最后是双方谈判的结局。实际上我们在1980年代看到这种情况了。那时，当局放松了，民间的异议声音壮大了。当局不断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试图加强控制。到1989年，民间力量壮大到北京上百万人上街，在天安门广场持续示威那么久的时间。但是，从来没有进入双方谈判的阶段。为什么没有进入这个阶段呢？这很重要，但今天没有时间去探讨了。

今天我想讲，为什么不一定是这样四个阶段呢？主要是我对“当局放松”这一条有异议。不一定当局要放才松了；不管放不放，它都松了，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会持续存在。刚才讲到，习近平如果被中共内部反习力量颠覆了，这些反习力量并不想让中国走向民主，就此而言他们绝对不会放松政治控制。但是，这仍然可以是一个机会。领导人更替之际，肯定要多讲讲社会经济发展，要显示某种温和态度，很可能还要采取亲美立场。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整个社会可以出现一些松动。不管当局放不放，民间力量要去利用这种时机提高声音，增加影响，扩大力量，直至形成行动。

讨论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我听到一种主流的反声音，就是：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可以讨论，而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人还是想回到江胡时代。我想讲的是：你想回到江胡时代，这是你精英阶层的主观意愿；如果江胡时代真像你们想象的或怀念的那样比习近平时代要宽松一些，那么，对不起，民间的民主力量就要利用这种宽松，不能让中国只按照新的当局所设想的路线去走。

这就是 transplacement(交叠替代) 了，你要改，我要革，咱俩就是这么配啊（笑）。不一定是主观上配合，但客观上我就要利用你了。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可能松动的机会，这对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重要的关节，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问题在于，能不能形成强大的、有一定组织性的、有明确民主诉求的力量。现在当我们讨论习近平之后的中国或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时，甚至鲜有听到有明确民主诉求的声音，某些据称是民运人士的力量也认为只能有习近平之后而不可能有共产党之后，这是共产党的声音还是民主力量的声音啊？习近平之后的中国走向哪里，民主力量的诉求必须是民主化啊，民主力量必须要入局博弈啊，这是第一点，也是最起码的。你连明确的民主化诉求都没有，哪还有什么革改不改啊？

第二就是一定的组织性，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共产党的权力垄断，根基之一就是对于组织性的垄断：只能共产党搞组织，其他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决不容许公民的自组织。那么，怎么办呢？我看，中国的民主力量要从列宁主义的组织观念中走出来。不要一搞组织就是列宁主义式的组织；没有这种组织，没有这种严密的集权体系，没有自上而下的

等级和约束，好像就不叫组织了。现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应该有新的组织观念。

第三，怎样才能强大呢？很明显，力量在于民众。现在中国的民怨这么多，你非要说民怨只是针对习近平的，不是针对共产党的，你还讲什么民主？共产党里的人这么讲，那是可以理解的；你搞民主的人也这么讲，那你根本就不想搞民主，你觉着老百姓也不是要民主。什么叫要民主？老百姓要自己的权利，就是要民主。不管要什么权利，这都要民主。不是说他一定要说我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我明天要选票，我要多党制，这才叫要民主，那是概念的民主。实际的民主就是民众对自己的权利有要求，要保护，这就是民众在要民主。看不到民众要民主的这样一种诉求、这样一种力量，只看到共产党高层那些和习近平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的一个严重缺陷。

2022 年的白纸运动，如果有明确民主诉求，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有相当强大的一个反对派力量存在的话，这场民变就有可能进一步发酵和升级，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现在这样的施政，民间怨声载道，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民变。“革改”能不能出现，就看民间力量、反对派势力、民主运动是否具备战略眼光和战略操作能力了。

王：过去几十年中间，一谈到民主转型、民主化，对中国未来进行某种民主想象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提出来两大担忧：第一，经济会不会持续衰退啊？会不会崩溃啊？第二，国家会不会很乱？当年苏联东欧剧变后，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官方媒体都渲染转型后发生的急剧经济滑坡。另外，长期以来，共产党一直在输灌、强化民主会乱的担忧。所谓“稳定压倒一切”，

其潜台词就是民主会乱。他们这样来为高压统治和拒绝改革做辩护。你对这两大担忧怎么看？

吴：这两个问题，我想是抓住了共产党对于民主化的妖魔化。但我觉得那也算是有根据的妖魔化（笑）。

为什么说有根据呢？先谈经济问题。我们知道，民主政体下一般来说经济发展会相对公平，当然也不是绝对公平。民主的力量越强，发展的模式就越会相对公平一些。而相对公平的经济体，一般都不会发展速度太高。所谓相对公平，就包括了这种情况：一个人没有那么努力地去挣钱，但他们的起码生存权利在民主政体下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民主制度下总是容易走向福利社会，这是有制度根源的，并不单单是因为左翼思想的影响。

似乎中国民众长期不能接受这一点，共产党也在利用这种心态。习近平这些年总讲，不能不劳而获。这种观念其实是非常落后、很成问题的。有的人没有劳动能力，在一个发达、繁荣、公平、有人性的社会里，你能眼睁睁就让他去死掉吗？你家里如果有一个孩子是残疾的，劳动能力很差，你难道就让他饿着肚子，只让其他能干活的孩子吃饱饭吗？就这种观念，还讲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福利的发展会对经济发展速度构成制约，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制约。

另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也不再会持续高速发展。我们知道，民主化发生的经济体，一般都是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了。大家都穷得吃不上饭，还想不到要民主。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现代化到一定程度，它的发展速度也会相对缓慢下来。所以，民主化发生的经济体，一般来说，

经济增速确实是会降下来的。但是，这种减速是合理的，不能把任何情况下的经济增速降下来都给它妖魔化。在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有一个基本术语叫“经济起飞”。起飞阶段当然是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过去一些年就是处于起飞阶段。但起飞之后呢？没有一架飞机是不断地、持续地处在起飞中的，起飞以后必须是平稳飞行。

所以，一个经济体在过了起飞阶段的高速增长以后，也会进入一个平稳发展阶段。这个时段经常会和政治上的民主化相契合，因为当一个社会经济上日子过得可以了，不必要再那么一门心思追求经济发展了，人们对于其他的权利要求、尊严的要求、说话的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要求就起来了，民主化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这两个之间确实有种相关的关系。

要打破唯经济论、唯增长论，不是只有经济高速发展这个国家才算治理得好。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就不断有这样一种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观念。毛时代的中共祸害到中国人饭都吃不饱，这也强化了人们追求经济发展的意愿。中国模式下，广大民众难以充分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又慑于专制政治的高压，也会形成一种心理，就是觉得只有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自己的生活才有改善的可能，而不敢也很难认识到，如果民众有公共权利而可以影响到国家政策，通过自由表达和民主参与从而可以使得财富分配相对公平一些，哪怕经济增速低一些，民众的物质生活也会更好，福利也更有保障。现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经济走低，普通民众的生活首先受到冲击，这样的心理也许更强了。实际上，民主化以后，经济可能不再那么高速增长，但比威权主义政权下的高速而不均衡、分配不公的经济发展，对全体国民是更有益处的。中共渲染民主化以后经济增长放缓，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有根据的，但其中的逻辑是扭曲的，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至于“乱”，也有一个关键问题：什么叫“乱”？我是当老师的，打个简单的比喻：在中国我上小学的那个年代，学生在教室里都要背着手坐在那里。那么，是不是大家都不背手了就是乱了？老师讲话的时候，学生一举手就可以发言，这是不是叫乱？你如果习惯了老一套，可能就觉得，学生连手都不背了，这不乱了吗？老师讲话的时候你要求发言，这不是乱了吗？

回到社会问题：大众对于乱的一个最基本的担心，就是犯罪率上升，整个社会暴力蔓延。基本的社会秩序不存在了，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没有保障，我想这个肯定叫乱。那么，我要问的是，在现在中共的体制下，你的财产安全有保障吗？现在搞“远洋捕捞”，在全都是共产党政权的现实下，山东的政府保护不了山东的居民，遇到河北的警察来“远洋捕捞”，把你的财产给搞走，这是不是叫乱呢？我想，这应该叫“乱”。

说到人身安全，中国各地不断发生恶性无差别伤人事件，人身安全有保障吗？这种事当然不仅中国有，其他地方也会有。如果美国有，中共就说是因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才会这样子的。那么，中国没有民主，没有自由，那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因为中国贫富悬殊，那么中国为什么贫富悬殊呢？有人说是因为经济下滑，那么中国经济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国家经济持续表现不好，也没有经常发生这种事。

还有，中国的食品安全一直是个很大的问题。这叫“乱”还是不叫“乱”？

“乱”的概念还有一点，就是社会的规则不清楚、不一致，有特权的人不受约束，机会不公正、不平等。你看前段时间爆出的协和医院董小姐（董袭莹）的事情，读的是经济学却做了医生。连当医生都不要资格认证了，

有一点小特权就可以把不知道以前学什么的人塞进来当医生，这叫不叫“乱”？乱到你人命安全受到威胁了，我说这是最深层次的乱。这个社会相当一部分的精英阶层已经完全不按照社会规范来做应该做的事情了，这个就是“乱”，是社会规范失效了。

在法治社会，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大家都能做。这种情况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可能就是乱了。还有，老百姓的意愿可以随意表达，是不是叫乱？

我不是讲，从专制政权走向民主社会，民主化过程中不会出现以上这些无论什么意义上的乱象。会出现一些，这是因为：第一，在专制下，这些乱象已经积压、积蓄在那里。有的是专制政权本身所产生的，有的是专制政权所鼓励的，也有的是专制政权在那里压制着的。这些东西不会因为民主化而一夜之间消失，社会不可能一下子就健康了。

第二，共产党是完全靠压制来维持秩序，而民主政权不能完全靠压制，更多地是要靠法治，靠公民与公民社会本身。法治的建立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善起来；整个社会的自发组织能力、自发的秩序维持能力，公民的素质，也都需要时间来培养和提高。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共产党在有根据地搞妖魔化。本来是你做下的恶，是你带来的乱象，结果你反而以此为根据来告诉人们：只有我能够摀住这些乱象。以作恶来反过来论证维持高压的正当性，这是无耻的循环论证。看一下中国的舆论宣传，那对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有多少妖魔化啊。可实际上谁都明白，到底生活在哪个社会，你的人身安全、社会安全、财产安全更有保障？中共把自由民主说得这么可怕，为什么中共高官都要把孩子送到

美国来读书、生活呢？

王：谢谢你对与民主化相关的两大担忧的辨析。的确，无论经济放缓还是什么“乱”，我们都需要审察自己所持观念是否站得住。你提出民主化后经济增速放缓的合理性、增长的平稳性，这一点很重要。刚才我提到了官方媒体、知识人 1990 年代曾渲染苏联东欧转型初期经济的下滑。我想补充的是，东欧国家平均在 2-4 年后经济反弹、开始平稳增长。这一点后来国内却很少有人提到。今天中国跟 1990 年代已经不一样了，平稳增长是值得期待的。

除了经济担忧，这些年我在与异议圈之外许多人的交谈中，一谈到中国民主化，听到最多的是“会不会天下大乱”？对于许多人，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好像有难度了。共产党没有了，这个国家还会有政权，有政府，不是没有政权、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人维持秩序了。

吴：按现在的说法，中国有 5,000 多年文明史。共产党执政到现在也不过就是 70 多年。如果不能想象没有共产党的中国，那么，在这 70 多年以前的 5,000 年里，就应该是没有中国文明的才对，是吧？（笑）

王：对啊（笑）。70 年好像塑造了一种永恒的感觉，这是很成问题的。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要讨论。一个就是没有共产党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东欧当年民主化之后，共产党——除了捷克共产党——大多洗心革面，重新包装上市，就是改组成社会民主党。当然，名称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波兰那叫做左翼联盟，但是它们在政治光谱上都属于那个类型的政党。它们改组成社会民主党以后，参与民主前提之下的政治竞争，而且不久后

就开始赢得选举。比如，1995 年，波兰左翼联盟的候选人克瓦尼茨基当选总统，他以前是共产党的一个政府部长。你认为，中国共产党未来改组为社会民主党，是不是它的一种选择？

吴：这个要去问中国的共产党人（笑）。可以给他们出一个主意，要看他们如何选择、如何来面对未来的政治转型。我觉得，粗略地讲有三种大的可能。第一个，就是随着社会矛盾激化，习近平的共产党或者习之后的共产党进一步极端化地站在民众的对立面，以至于走向纳粹化、法西斯化。对外也可能进行战争。还有比如说向全世界扩散疫情。总之就是继续作恶了。那么，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在未来可能会被国际社会追责，也会被中国民众看作像纳粹一样的一个罪恶符号。走到那一步，不说共产党里的每一个人，至少共产党作为一个符号，怎么改头换面可能都难以新生了。

另一种前景就是俄国式的发展。本来有民主化，但半途而废，最后出了一个普京，一个政治强人在半途中劫持了民主化转型。共产党垮了，但是共产党式的专制还在。这个新的专制者可能并不喜欢看到共产党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你看，俄国共产党再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只要普京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现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在那里讲反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家天下，还希望回到共产党的党天下。但是，我相信，习近平不会把共产党这个组织体系抛弃掉。那么，假如习近平搞终身制，即所谓家天下，共产党整个组织体系接受就是了，共产党就变成了习近平个人的一个组织体系了。这也是一种可能。如果不接受那种改变，而是愿意顺应民意，与民间力量合作，在结束习近平个人专制的同时也推动中国走向结束共产党专制的民主化，

则共产党在民主化转型中有可能扮演一个关键乃至主导的角色。

你刚才讲的社会民主党这种可能，对广大的共产党人来讲，应该是他们乐于见到的前景。不过，我觉得，在未来的民主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分裂成好几个党，而且不一定是左翼政党。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光谱中，右翼势力也很大。

确实，现在的共产党人或那时的前共产党人，都应该多去了解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及此后的政治变化过程，这对他们会是有启示的。我看，东欧的情况表明，共产党人在共产党之后的民主政治中有很多优势。第一，共产党人有长期治理国家的经验。共产党一党专制下，不进共产党，就没有办法掌握公共权力。在中国，从1949年一直到现在，你不是共产党人，就不可能成为政府首脑。政府治理的经验，在未来的公平竞争当中，会对共产党人很有帮助，无论那些前共产党人以什么新的政治面目出现。

也就是说，个体的共产党人，如果洗心革面，那么不管加入哪个党，其实都有一个优势。假如说你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某个二线三线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将来你和一个海外回去的民运人士竞选当地领导人，除非你曾经作恶多端，不然你一定有优势，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治理了好多年，了解怎么样治理那个地方。这种治理经验，是共产党中青代官员未来在民主化下最大的政治优势，比他们在共产党制度下的仕途前景、政治前景都会更好。但是，对共产党人来讲，首先你今天在共产党制度下不要作恶太多。

共产党不仅垄断权力，也垄断资源，包括人才资源。共产党现在把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才最大限度地吸纳到它里头去。很多各方面的人才不一定认同

共产党这一套，但他要在中国做事情，没办法，最后也去加入共产党。可能本来就是作家，这就弄个作协主席、副主席干干。这些人也是共产党员，也属于共产党的精英阶层，但不是行政官员。一旦共产党制度解体，这些人才都能更好地发挥出作用来。其实，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为一切人打开参政从政的大门。一般的老百姓都能够影响政治，你过去有资历的官员、有能力的干部，自然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共产党作为专制政党，它的内部也是专制的；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党员甚至干部表达意见的机制。这样呢，我觉得，要那些今天的共产党员和官员个体都在将来为共产党的施政和罪恶负责，对他们可能也不够公平。但是，他们每个人必须对自己个体的作为负责。你搞拆迁迫害老百姓，你在疫情期间借机发国难财，等等，这将来在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一定对你有正义的审判。

王：你曾提出建立民主工程学。为了走出共产党统治建立民主，你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研究关注哪些问题？

吴：咱们很难给中国知识分子指明方向吧？（笑）这个问题我就不谈了。我简单补充一个结尾。我提出“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以来，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最常见的一种批评是说，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这是不可能、不实际的。有一些持这种看法的人，1989年的时候反而是共产党速垮论者，认为中共在一两年、最迟三年内就会垮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共拥抱全球化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这个声音当然就完全听不到了。结果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觉得共产党会千秋万代下去，以至于到今天也无法展望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不可能论者对现实的分析，有很多我也是赞成的。比如说，中国的反对力量非常弱小，中国的军队完全被共产党控制，共产党掌握的经济力量、财政力量、国力非常强大，共产党有洗脑机器，等等。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无疑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艰巨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个还不是民主政体的大国的原因。

今天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并不表示未来发展就不会走向这个方向。就人类大势来看，这两条，一条是权力（power）受到制约，一条是权利（rights）得到保障，这是每个社会都在追求的目标。用一个词来说，这就是民主。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已经有的民主制度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了。有的似乎是样板的民主，在两个方面也都还有缺陷。但是，人们还在不断往这个方向追求。就是说，现在的社会，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一种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不受制约的安排，也没有任何人愿意承认说，我是一个不需要尊严的人，是不需要权利的人。世界上没有人愿意那么生活，中国人也是同样的。中国人一样也会追求权力受到制约、权利得到保障的这么一种生活，因此也必须建立这么一种政体。这种政体怎么样来建成，转型怎么发生，这里的学问很大，但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人们自己去追求，去努力，去推动的。中国走向共产党之后、走向民主化的基本动力就在这里。怎么使这种动力做功而把上述追求变成现实？怎么在中国建成这种制度？这就是我称之为民主工程学的内容了。

从江胡时代走到习近平路线，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因此出现了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这样一种趋势、这样一个可能。为什么说共产党气数已尽呢？从江胡到习近平的发展显示，共产党要想维持政治专制，就不能不把共产党的原教旨那一套抛弃掉，而一旦抛掉那一套，它马上遇到来自它必

须接纳的那些新因素对它的挑战和威胁——这包括刚才讲的民间企业、公民社会、国际力量等等。一个东西按照自己那一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必须借用别的东西才能续命，而这些“别的东西”又对它构成致命威胁——这样的东西还不是气数已尽吗？

不要看现在国际社会好像进入了民主低潮期。这其实不过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节奏。美国民主的衰落，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民主就不能兴起。中国人要民主，要官员和公权力受到制约，要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是中国人自己的利益所在。既不是美国人要你这么做，也不是你需要美国才能做到的。

王：共产党几十年的统治，让许多人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力。我做民主转型研究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过去几乎所有的专制政府、独裁者，都高估自己的控制力。生活在独裁政权下面的人也往往觉得它太强大，好像会永远存在下去。但独裁政权的倒台、变化的发生，其迅速好像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我们可以回头看历史。当年苏联东欧的剧变，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西方很多战略家都没有预料到。还有，2010年的时候，我们没料到2011年穆巴拉克会下，突尼斯的本阿里会出逃。不要失去想象力（笑）。

吴：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因为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没有共产党专制或别的什么政治专制的状态下。中国人来到别的国家，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没有共产党专制，中国人在这里就无法生活了吗？台湾也是华人社会，那里的人每天是怎么生活的？那里没有共产党，他们是不是生活得更好？咱们今天讲得比较概括，但我希望，讨论没有共产党以后的

中国，要把生活细节勾勒出来。实际上我们不用去想象，就把一个台湾人一天到晚的生活是怎样的，遇到与政府相关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告诉中国人；把一个波兰人在 1989 年事变之后他的生活怎么和以前不一样，告诉中国人。别人都这么生活，生活得都比以前更好，为什么只有中国人一旦这样就会生活得更差呢？

王：谢谢国光教授精彩的分析。今天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希望回头有机会还继续讨论。